

李鸿章大传

以一人敌一国

叶曙明

著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李鸿章大传

以一人敌一国

叶曙明
著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以一人敌一国 / 叶曙明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
（李鸿章大传）
ISBN 978-7-5399-9217-4

I. ①以… II. ①叶… III. ①李鸿章（1823～1901）—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5595 号

书 名 以一人敌一国

著 者 叶曙明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217-4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筚路蓝缕	001
无所作为的一年	001
进驻京畿	008
自强新政之梦	022
主持国防与外交	032
睁眼看世界	038
圣贤与豪杰	045
 大海潮涨	054
轮船招商局	054
琉球风波	065
为华工争权益	070
日本侵台	080
塞防与海防之争	090
马嘉理事件	102
 举步维艰	116
吴淞铁路的悲剧	116
矿业艰难起步	125
大灾之年	134
收购旗昌风波	140

创办电报业	147
经营台湾	154
游走刀锋	161
中俄危机	161
电线铺进京城	178
突破重围筑铁路	183
织布局的困局	191
筹建海军	199
日本趁火打劫	213
中法战争	231
密云待雨	231
刘义打番鬼	240
和战不定	251
马江的惨败	260
从淡水到镇海	269
虽胜犹败	275

筭路蓝缕

无所作为的一年

同治八年（1869）正月，久经战乱的人民，总算过了一个太平年。乡村“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取代了枪炮声。宗族亲戚互相拜年。初七以后，四乡八镇，金鼓喧阗，灯戏不绝，采茶灯、麟凤灯、车灯、船灯、走马灯，街市旋舞，大放光华，汇成多少年未见过的欢乐海洋了。

初十，有江苏解饷轮船前往武昌，路过安庆，李鸿章陪着母亲乘便船去武昌，赴湖广总督任。虽然李鸿章做过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但一直戎马倥偬，没在衙门里待过几天。现在，天下拨乱反正，治疗创伤，他很想认认真真为朝廷办一些事。

官船逆流而上，一路上，看不尽两岸残雪，满天风云。元宵第二天，李鸿章的船抵达武昌，当地缙绅都到码头迎候。武昌也沉浸在上元的热闹气氛中，“正月半，敲铁罐”，家家张灯结彩，户户敲锣打鼓，没有锣鼓也敲响盆罐。满城笙歌聒地，沸反盈天，一直到十八日才算平静下来。正月十九日，李鸿章正式接任湖广总督。他马上发现，地方上的政治、经济、社会，一团混乱，千头万绪，要理顺它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不由得感叹：“素乏吏才，人地生疏，不知从何下手。”^①

李鸿章上任后，最感头痛的两个难题，一是想来的来不了，二是不想走的却走了。他到湖北后，首要之事是裁撤鄂军。当时鄂军有水陆五十余营，积欠饷

^① 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银两百余万，按湘军旧例，全数补足，然后可以裁撤。这已是一笔难以筹措的巨款了，而湖北本省也要用款，淮军也要维持，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与回民作战，朝廷又要李鸿章协饷，处处要钱，钱从何来？李鸿章为此绞尽脑汁。

裁撤鄂军，对准军是有利的，因为鄂军省下的军饷，可以接济淮军，但接济左宗棠，替他人做嫁衣，李鸿章一百个不乐意。二月十七日，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奉派协陕甘等处紧饷，羽檄交催，实属万难措手，约须一年以后方可周转，焦灼曷任。”^①他给继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信也抱怨说：“鄙意俟鄂军次第裁定，或分所余，以供调鄂之淮军，今陕饷太巨，数月后尚难筹拨，遑及其他。”^②

三月十八日，李鸿章勉强拨了三万两银给左宗棠，然后写信给他，表明不能如数协款：“鄂军积弊之余，久未得撤，昨已裁遣姜玉顺、蓝斯明各营，算补欠饷卅余万，逐渐清理，非一半年不克就绪。而财用政事，自胡文忠（林翼）后，颓弛年久，所入大减。中外以例案资格相束缚，竟至挣扎不起，随俗浮湛，尤内愧耳！各省厘金本成强弩之末，当事竞沽美名，迭经裁减，无复综覈，约计收数实远逊于前。部拨尊处协款，恐俱不能如额。往岁以本省厘捐办本省军务，今以协济远方，人情之缓急相背，理势固然，无足怪者。至鄂中则为疲军所累，非去腐不克生新，稍假时日，资遣略定，当悉索以奉公需。”^③

让李鸿章深感不快的，不仅是要替左宗棠筹饷，而且朝廷还把淮军大将、山东布政使潘新鼎发往左宗棠军营差遣，直隶提督刘铭传亦奉诏督办陕甘军务，铭军唐定奎营调驻宝鸡，滕学义营调驻陇州，黄桂兰营驻凤县，并要刘铭传赴京陛见。

李鸿章固然极不愿意，左宗棠也不屑于他们援助，潘新鼎、刘铭传更是坚决不干，一齐向朝廷告假，并请开缺。刘铭传本来就是江湖儿女的性格，意气不合，扭头就走，以“同治三年围攻常州府城，头受枪子，伤口逾寸，其时裹创督战，失于调护，遂得头风之疾”为理由，甚至连两宫、皇帝的召见，也拒不进京。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鸿章：《复马谷山制军》，《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③ 李鸿章：《复左爵帅》，《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二月，他到武昌见李鸿章，坚决要求开缺回籍养病。就李鸿章内心而言，与其把铭军送给左宗棠，还真不如让刘铭传回家了。但他表面上还是劝刘铭传，不如先进京陛见，然后再请假。刘铭传死活不肯，径自回乡去了。于是，李鸿章代刘铭传奏陈：“据称，春季肝肠上升，病势加剧，必须静卧深山，屏绝人事，或可渐冀复元，并坚求奏请开缺给假调理，情词极为恳近，臣何敢壅于上闻？可否仰恳圣恩，准其暂开直隶提督本缺？”^①

李鸿章惋惜地说：“省三辞官卸军，牢不可破，弟以内意相需甚殷，湘相推轂甚切，无可畏避，彼竟悍然不顾，谓已剿平南北两剧贼，不求进而求退，罪似可逭。窥其意即加罪责，所不恤矣。此大将材，今日已是广陵散，朝廷宜宽礼数以待之，若有缓急，尚可投袂而起，若必如琴轩（潘鼎新）、海龄（周盛波），一律苛求，驱令披发入山，吾淮人才尽矣！”^②

周盛波是淮军大将，平定捻军后，以母亲年老，陈请回籍终养，寻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县民寨，惨毙多命，为巡抚李鹤年所劾而褫职，虽然在李鸿章的呵护下，免其科罪，但这件事令刘铭传、潘鼎新等人颇有乌尽弓藏、唇亡齿寒的忧惧。在潘鼎新的一再要求下，李鸿章代他请了三个月假，五月应潘鼎新的要求，以母亲“年届七旬，气体本极衰弱，今见子将远出，愁病益增”为由，再向朝廷续假，并请开去山东布政使本缺。李鸿章对曾国藩说：“琴轩劳苦过久，明知西帅（左宗棠）不容，又遣之去。其母逼令弃官偕隐，不得已而代陈，是亦天时人事之相迫也。”^③

潘鼎新、刘铭传都是李鸿章的心腹大将，他们的行止，如果说没有得到李鸿章首肯，谁也不信，京中有人以此责备李鸿章。四月初九，李鸿章写信向曾国藩解释：“省三回六州后，迭函恳催代奏开缺给假，悬宕已久，只有据情上陈，京友来书责备颇深，但彼既不去，又无人复奏，鸿章势处两难，惟吾师鉴此心耳。”他更感叹：“近来淮将暮气颇深，纷纷乞退，鸿章忝窃虚誉，每惧兵事不得脱身，旧部日渐零落，势难再兴，致负期许。”^④

刘铭传回到乡下后，没有了约束，当年那个“恶少年”，故态复萌，过着花

① 李鸿章：《刘铭传暂缓陛见折》，《李鸿章全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鸿章：《复知白斋》，《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③④ 李鸿章：《复曾相》，《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天酒地的颓废生活。六月初六，李鸿章写信给刘铭传，谆谆规劝：“久无嗣音，未知踪迹何处？传言与李良臣盘桓六霍一带，纵饮张乐，酣嬉淋漓，欲效信陵公子醇酒妇人以自乐耶？似未宜尔，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乃可敛浮气而增定力，窃愿吾党共勉之。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柯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十数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①十数年后，刘铭传果然复出，在台湾又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回头再看，李鸿章这番话，确实卓有远识。

李鸿章到了武昌几个月，忙于筹款，地方上应兴应革之事没干几件，五月二十八日，又接到朝廷五月二十日的上谕，派他到四川查办总督吴棠被参一案。

吴棠，字仲宣，号棣华，安徽盱眙（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以举人大挑一等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咸丰元年（1851）调任淮安府清河县令。坊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吴棠有恩于贫寒时的慈禧太后。

据说咸丰初年，吴棠的一位故友去世，其子扶柩回籍，路过淮安府清河县，当时吴棠是清河县令，派人送三百两白金到码头给故友之子，诂料衙差却把钱错送到另一条灵船上，船上一中年妇女带着一对女儿，千恩万谢。吴棠发现错误后，也不便把钱讨回，只好将错就错。再封了三百两白金，亲自送到故友的灵船上，顺便再到送错银两的船上慰问一番，那位中年妇女原来是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的遗孀富察氏，扶柩回乡，路过清河，正为盘资不够而发愁，得到素昧平生的吴棠仗义相助，自然感激涕零，再三拜谢说：“当世人情疏冷，先夫昔年寅好，半以人琴俱杳，无复有顾恤及寡妇孤儿者，独吴老爷古道热肠，不以炎凉异度，既厚赐赙金，复枉驾来言，我母女誓不能忘。”后来，这对姐妹中的姐姐被选秀入宫，也就是今天的慈禧太后。

这个故事，载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其后《梵天庐丛录》《清代野史大观》《睇向斋逞臆谈》《近世名人小传》《清史演义》《慈禧太后演义》等书，纷纷转载，愈描愈生动，细节愈来愈丰富，然可信度极低。因为惠征死于咸丰三年

^① 李鸿章：《致刘省三军门》，《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853)六月,而慈禧早在咸丰二年(1852)二月就选中秀女,五月进宫,封为兰贵人。时间对不上,而且惠征死时并不穷,断不至于连扶柩回乡的盘资都成问题。即使吴棠确有送错白金一事,而居于深宫之内、身为贵人的慈禧,亦不可能出现在兵荒马乱的淮安运河一带船上。晚清野史,这类破绽百出的“掌故”,比比皆是。

日后吴棠深得慈禧厚爱,短短几年内,从县令升至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青云路畅通无阻,与他一向官声良好,而且剿太平天国和捻军异常卖力,战功显著,不无关系,并非靠送错白金而获宠。

参劾吴棠的是革职留任的云贵总督刘岳昭(字荇臣,湖南湘乡人),他指吴棠赴川时,纵容仆从需索属员馈送,荒谬贪污,物议沸腾,主要证据是吴棠赴川时,眷属用了三千多名挑抬夫,每过一站非二三千金不办;到任后让人造了几十只大桶,准备用来装钱;收受属员规礼不下十余万金,又卖缺、卖差,甚至向洋人索贿;又指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人入川数次,每次必有馈贐,为数甚巨。

无论吴棠是否真有贪污行为,查办这种参案,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李鸿章颇为郁闷,但他也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他的大量时间精力,将耗费在官场的人事纠葛之中。李鸿章迟迟不行,直到七月初二,才从武昌慢吞吞上船,恰好又遇上刮风,船不能行,李鸿章在船上百无聊赖,听着天空的风声,时而呼号,时而低吟。江上浪涛起伏,拍打着船舷,船亦终日摇晃不定。他对这次行程,本来就抱着不紧不慢的心态,所以不能启航也不着急,每天以写信给曾国藩、刘铭传等人打发时间。他给曾国藩的信说:“鸿章初二登舟,阻风未开,上游江路险远,山径崎岖,往还约须四五月。奉旨带印出境,公事亦虞废搁。”^①

他又给湖北学政的张之洞写信,支持他筹办文昌书院。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一位学识渊博、抱负不凡的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李鸿章在信中说:“文昌书院创始艰难,经执事提倡风雅,振拔寒畯,弟甚愿观厥成。前与小宋方伯筹议,适值淫雨为灾,沿江巨浸,亟谋抚恤,而集费亦颇拮据。顷濒得复催,次第筹办,断无中止之理。据称,先择妥地,秋后兴造,一面减取苏州经古书院

^① 李鸿章:《上曾相》,《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章程，商提经费，详定立案，计阁下回省时，当有成议。望于晤时谆催之，期于必成而后已。”^①

九月十八日，李鸿章抵达有“天府之国”之称的成都。朝廷又命他会同当地督抚，一并查办酉阳与贵州遵义发生的教案。十月初三，他先就吴棠被参案复奏，声称吴棠忠厚廉谨，在江苏时已有循吏之称，到四川时仆从仅五十余人，并无用夫三千，四轿百余顶之事。“官声尚好，僚属皆知，何至一旦有此悖谬之举？”^②反而是因为川省习尚钻营，吴棠遇事整顿，令贪官猾吏不便，所以造谣污蔑。奏入，上谕吴棠力加整饬，勿稍瞻顾，而刘岳昭则因率奏失实，受到朝廷申饬。

了结吴棠参案后，李鸿章派道员余思枢到贵州，会办遵义教案，他自己则前往重庆，调查酉阳教案。自从天主教传入中国以后，明代因传教范围很小，尚属安静，及至清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国门大开，各地传教士利用治外法权身份及本国外交实力为后盾，态度益发飞扬跋扈，天主教遍及大江南北，与中国儒家传统的文化冲突，渐趋激烈。朝野之间，指斥天主教无父无君邪说，主张遣返所有教士，驱散全体教徒的声音，甚嚣尘上。

各地教案，层出不穷，安庆考生拆毁教堂、湖北天门烧毁教民房屋，反映了天主教在内地的传播，民众不明教义，认为是邪教，产生恐惧和排斥心理；而许多加入天主教的人，亦非出于信仰，而是以为入教就像入天地会、哥老会一样，有了一个洋帮派做护身符，可以一呼百应，横行霸道，出了事自有教会出面保护，遂造成信众与非信众之间的尖锐矛盾。

酉阳教案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同治元年（1862），法国天主教外方传教会川东教区主教范若瑟（Eugène-Jean-Claude-Joseph Desflèches），派遣传教士邓司铎（神父）到酉阳州办理教务，在距离酉阳城区二十里的小摇坝兴建教堂，名为公信堂。同治四年（1865），因教徒劝人入教发生冲突，当地人捣毁了公信堂和一些教徒的房屋，并打死了一名传教士。该案审理结果，主犯斩首，赔偿教会八万两银，而参与打教的当地团防首领张佩超，个人另赔偿教会二万两银，分期支

① 李鸿章：《复张香涛学使》，《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鸿章：《查复吴棠参案折》，《李鸿章全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付。但是，在后来追讨赔款过程中，双方屡屡发生冲突。张佩超的儿子被教民拘押致死，他的家亦被焚劫一空。同治七年（1868）十月，双方再次冲突，团首何彩聚众焚毁了火石垭教堂，继而捣毁州城教堂，法国传教士李司铎被烧死。打教风波迅速蔓延至全州及毗邻的贵州遵义等地。

一系列教案的起因，最初不过是教徒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小纠纷，不能妥善解决，愈演愈烈，双方皆有责任，最后变成杀人放火的重案，而且拖了一年没有解决，法国公使罗淑亚（Rochechouart）大为不满，于十月初七离开北京，声称准备带兵船四五艘到汉口，如果川黔还不办结，他就要带兵入川自行办理。朝廷顿时担忧起来，命李鸿章尽快结案。

十一月初七，李鸿章到了重庆。法国人气势汹汹，直指该案主谋是张佩超，杨正庭是正凶。但李鸿章处理教案，先弄清楚事情原委，再判断是非，并非不问情由地支持中国人或外国人。在遵义教案中，有一名教士被打伤，后来病死了，中方说当时他死时伤已快好了，是因病而死，与伤无关；而洋人坚持说是因伤而死。双方各执一词，争讼不已。李鸿章的意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验尸，查明死因。如果洋人不同意验尸，就等于放弃追究致伤之人。他提出以事实为依据，分三步解决：

先验赵姓（死者）是否伤毙，如系因伤，即应查拿下手正凶，照例惩办，不过监禁充发；如主教勿勿检验，亦可不追究致伤之人。次则与主教等议明如何赔修教堂及查还赔偿教中所抢失财物田产。次则与官绅等要约，嗣后民教各不相欺凌，遇有控案，持平判断，以冀永远相安。以上三件若有一不能办妥，断不能结。^①

这个解决办法，有理、有据、有节，与当初曾国藩传授处理夷务“忠信笃敬”四字诀，颇相契合。李鸿章认为，在酉阳教案中，张佩超是否主谋，并无确凿证据，况已家破人亡，宜从轻发落，而“正凶”杨正庭亦已在逃亡过程中病故，只有一名“打教首犯”何彩仍然在逃，经悬赏缉拿归案，十一月三十日，斩

^① 李鸿章：《复余紫垣观察》，《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决正法。教堂被破坏，由官府赔一万八千两银，重新修葺；张佩超欠的尾款，由官府代垫；行凶的教徒亦由官府函会教会方面密速访拿。这件案算是结了。

处理完酉阳教案，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忠告：“嗣后遇有教民涉讼，必须查照约章，由地方官持平核办，毫无偏纵，不准教士干预把持及书差搥索拖累等弊，庶几疑忿渐释而后患可消。”罗淑亚声称带舰入川，系虚声恫吓，“窃料川黔山径崎岖，民情浮动，该使兵船本不得到，亦断不敢带兵深入。”^①

处理教案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只要严格按照约章，公平处理即可，根本不会把事情愈闹愈大，也不必一听洋人威胁，就吓得手忙脚乱。可惜现在的地方官，遇事不懂得在约章里找依据，而是先煽动民众的排外情绪，等到民众真被煽动起来了，又控制不住局面，以至于事态不断升级，最后变成外交事件，要朝廷派钦差去解决。

教案事完，李鸿章便踏上回程。当他回到武昌，已是挨年近晚的时节了。他在汉口又会见法国领事，在其一再纠缠之下，把酉阳教案的赔偿金额，提高到五万两。有一个细节，被外国记者留意到了，法国领事到总督署时，是从正门进入，而英、美领事到访，则安排从侧门进入。小家子气的性格，在细微之处，显露无遗。

上任湖广总督的第一年，就是在这东奔西走之间过去了。计划中的种种战后建设项目，依然在乌有国中。李鸿章不禁长叹一声。

进驻京畿

转眼又到了同治九年（1870）正月。李鸿章在武昌过了四十七岁生日，正月初七，接奉上谕，派他督办贵州军务，肃清苗乱。由李瀚章代理湖广总督，杨昌濬署浙江巡抚。对这个任命，李鸿章深感失望。

其实，自从到上海与常胜军接触之后，李鸿章已痛感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是

^① 李鸿章：《委员查办遵义教案片》《起程回鄂片》，《李鸿章全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技术的差距，是工艺的差距，外国有开花炮，中国只有劈山炮；外国有火轮船，中国只有木帆船；外国已经有火车了，中国人却还骑着小毛驴赶路。这一切，都让李鸿章痛心疾首，心急如焚。自从平定捻军以后，他内心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建设计划，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认真研究外国的兵备、财用、工商、艺业，开办机器局、军械局、轮船局、工厂，尽快建造自己的火船、气船、开发矿藏、修筑公路、铁路，富国自强，乃可争世界一席之地。而现在朝廷却派他去穷山恶水的贵州，与苗人打仗，不知又要耽误多少光阴了。

李鸿章既不想去贵州，也不敢抗旨，便要起他惯用的“拖”字诀了。正月十三日，他上了一道《遵旨援黔筹陈大略折》，指出当前“黔省兵事尚非急在旦夕”，提出援黔有三大困难：第一是饷项奇缺，皇帝不差饿兵；第二是山路险阻，军情不通；第三是采办转运困难，后勤无保障。这三大困难不能解决，“但若贸然前往，明知无济而又不预为筹画，尤于微臣平日治军敬事之素志大相刺谬。”他请朝廷“勿责速效”，“俟李瀚章到鄂交替，并后路筹有规模，即行启程，由湘赴黔”^①。

正月二十三日，朝廷发表三年考绩，李鸿章以“韬略优长，懋昭勋绩，交部从优议叙”。朝廷似乎也没再提去贵州之事了，李鸿章不禁为之窃喜，詎料二月中旬，朝廷忽然下旨，调李鸿章督办陕西援剿事宜。

陕甘回民之乱，由来已久，同治元年（1862），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爆发大骚乱，遍及陕西、甘肃（包括宁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并与太平天国和捻军结盟。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对回乱展开严厉打击，同治六年（1867）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受命后，于翌年六月成功把捻军镇压下去，然后制定三路平回之策，北路由绥德取道花马池，进攻金积堡；南路由秦州进攻巩昌、河州、狄道；中路由左宗棠亲督大军，自乾州沿陕甘大道入甘，把回民军主力逼入甘肃，聚而歼之。同治八年（1869）八月，北路的湘军悍将刘松山在作战时阵亡，回民军有杀返陕西榆绥延各属之势，朝廷急调李鸿章到陕西防堵。

对李鸿章来说，这比要他去贵州还糟，他形容是一个“味如嚼蜡”的任务。

^① 李鸿章：《遵旨援黔筹陈大略折》，《李鸿章全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李、左二人本来就不和，更兼陕西是左宗棠一手打出来的天下，岂容淮军染指，以前朝廷调潘鼎新、刘铭传去，左宗棠已不乐意，如今三路合围，胜利在望，更不愿意别人来分果实了。左宗棠以“今亮”自居，七擒七纵，不在话下，若李鸿章亲自去，显得自己平不了乱，要求助于李鸿章。以其孤傲倔强的性格，绝不会答应。

李鸿章继续拖延。二月二十八日，他写信给曾国藩说：“秦事殊棘，敝部甫经整理入黔，行有日矣，今改北辙。饬郭（松林）、周（盛传）两军重招马队，乌合难恃，铭军骑营，务求全数准调为感。”^①也就是说，要去陕西，必须重新招募军队，又把铭军的骑兵从曾国藩那儿调回，旷日累时，在所难免。

二月三十日，李鸿章上奏朝廷：“查西北地形平旷，非马步兼用不能得力，回骑飘忽肆窜，尤非马队无以制胜。臣与郭松林等再四筹商，身边无一骑一驼，何以应敌致远？亟饬该提督派员分赴皖豫一带，赶募马队五营，步队十营，周盛传赶募马队四营，克期齐集，认真训练，并添购车骡，豫办粮草，以利师行。由鄂入陕，饷项军火，节节转运，均由陆路，事体亦甚繁重，现于湖北省城设立后路粮台，分遣妥员沿途察勘，设局接运。应俟诸务筹布就绪，郭松林、周盛传等募练成军，即督催分起前进。”^②他把出师的准备事项列了一大堆，等他按部就班，把一切准备妥当，黄花菜都凉了。

三月初二，李瀚章到了武昌，李鸿章把湖广总督的关防移交给他，然后启用“督办陕西军务协办大学士湖广总督行营”木质关防。三月二十四日，李鸿章拜别母亲与兄长，慢吞吞爬上船，解缆扬帆，逆流而上，前往襄阳。当武昌城渐渐消失在春天的烟雨之中时，他并不知道，这一走，与母亲便永无相见之日。如果知道，他还会走吗？

四月初十船抵襄阳，停留了十几天，四月二十四日才动身，继续西进。四月十六日，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传率盛仁各军步队十六营及新招募的马队三营，从周口拔队，向着千里以外的潼关，迤迤前进。湖北提督郭松林率步队十五营开抵樊城后，以采办的骡马尚未见到为由，又停下来等候。李鸿章奏称，他连

① 李鸿章：《复曾相》，《李鸿章全集》（五），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李鸿章：《奉旨援陕酌筹派拨折》，《李鸿章全集》（二），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日正在雇觅车骡，俟准备停当后，即率大队由南阳、陕州大道“驰赴潼关”。

五月十六日，李鸿章终于“驰抵”潼关，命令郭松林从蓝田入西安，周盛传从同州入陕北，以守防边，兼护左宗棠后路，但不愿再往前走了，他给郭松林写信说：“至西北则不敢不图稳。”潼关位于陕西东部渭河下游，扼晋、陕、豫三省要冲，素有“畿内首险”“百二重关”之称。上谕催李鸿章赶紧进驻西安，李鸿章实在拖不过了，六月十二日只好从潼关起程，时而说阻风，时而说阻雨，直到六月二十七日，才到达西安古城。眺望前方，已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了。李鸿章内心叫苦不迭，以为自己无可避免，要在这“四面边声连角起”的西北地区，开始新的征战生涯了。

然而，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李鸿章的位置，注定不在西北。这时在天津发生一起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机构，造成数十名外国人遇害，外国的军舰驶到天津，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朝廷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调查并与法国交涉，这回曾国藩的“忠信笃敬”不起作用了，其所持的调和立场，受到朝臣的猛烈抨击，洋人亦不接受，事态再现升级危机。

天津教案的起因，是在同治九年（1870）初夏，天津城乡忽然出现一种谣言，说天津地方有几百名幼童失踪，是被拐匪用洋人的迷药迷拐，卖给法国教堂，每诱拐一名儿童，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对幼童挖眼剖心，配制西洋药方。类似的谣言，历来都有，并非天津一时一地为然，早在魏源写《海国图志》时，就有基督徒把华人的眼睛挖出来，配以铅粉，炼制白银的记载，当然是无稽之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众的排外心理，较战前更为强烈。同治八年（1869）法国租用天津三岔河河北岸，拆除了原有的建筑望海楼，用来兴建圣母得胜堂。望海楼是皇帝到望海寺和崇禧观（原名香林苑）上香时驻蹕之处，既是庙宇，也是皇帝行宫。天津人认为，这是洋人有意对朝廷和皇上的羞辱。仇恨与恐惧的发酵，只要有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就会变成随时爆发的火山。

几年前，一群法国仁爱会的修女，在小洋货街开办了一所收养孤儿的仁慈堂，最初颇受教众欢迎，同治七年（1868）至同治八年（1869）一年间，就有五

万六千人次接受过教堂的救济，四万八千人次在施药局就过诊；寄养婴儿一百零九名，育婴堂婴儿一百七十名。然而，自从传出法国人要拆卸望海楼的消息后，天津人对法国人的敌意，愈来愈强烈，修女们说：“尤其是这里的妇女，一见到我们走在大街上，就说：‘看！洋鬼子来了。’随即万分惊惶地赶紧关门。”^①许多关于育婴堂的谣言，开始在坊间流传。

官府一如既往，在危险刚露苗头时，无所作为，坐等事态恶化。仁慈堂最初收养弃婴不多，修女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对每个送来弃婴的人都给予奖金。她们没想到，这个本来是善意的鼓励政策，竟使许多人冲着奖金，纷纷把偷来的、抢来的、拐来的婴儿送到仁慈堂。很多婴儿送来时已奄奄一息，死了以后，修女们用薄棺埋葬，又被野狗刨出来，撕咬得皮开肉绽、曝骨履肠，于是人们哄传是被教堂“挖眼剖心”。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引起民众极大的恐慌，一见可疑人物，就当作“拐匪”扭送官府。

不少被抓进官府的“拐匪”，刑求之下，屈打成招，令谣言变得更加可信，街头巷尾，出现了无数煽风点火的檄文揭帖，令民众对教堂愈加仇视。一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天津桃花口民众抓获，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武兰珍挨不住拷打，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指派，前来诱拐儿童。

五月二十三日，官府把武兰珍押到教堂对质，结果发现口供对不上事实，教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指不出一个相识的教友。人丛之中，忽然有人高喊是教堂做了手脚，掩盖真相。民众的愤慨情绪，又复挑起，与教会人员互相对骂。围观者愈聚愈多，气氛愈来愈紧张，有人开始向教堂内抛砖掷瓦，事态遂告失控。

法国领事丰大业（M.H.V. Fontanier）闯进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崇厚态度消极，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法国领事竟拔出洋枪，连开两枪，幸未伤人。出了署衙，丰大业在海河边的狮子林桥上，遇上知县刘杰，争吵之间，又开枪打伤刘杰的家丁。

当天傍晚，天津全城鸣锣，万民聚集，掀起狂涛巨浪。民众包围了法国领事馆，砖块、木棍齐下，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被愤怒的人群当场殴毙。刚建起

^① 赵永生，谢纪恩：《天主教传入天津始末》，《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